

# 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

## ——鲜卑遗迹辑录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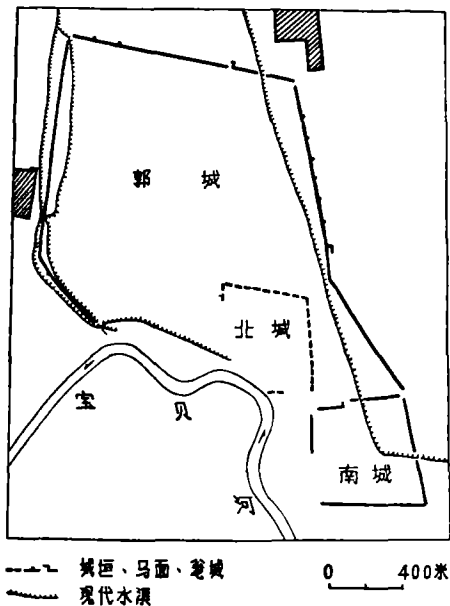
宿 白

三世纪中叶，向西南迁移的拓跋鲜卑，游牧在河套东部。四世纪初，他们活动的范围大体上逐渐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和山西大同一带。四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在拓跋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拓跋第一个政治中心盛乐（今和林格尔北）开始稳定下来，前此的部落联盟组织遂为初期的国家所代替。四世纪末，拓跋珪称帝，建代、魏，（以下统一称北魏）是拓跋鲜卑明确地建立了国家组织的标志。接着，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大同）。北魏都平城，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前半，拓跋统治集团到处掳掠人口，仅据现存文献记录，估计当时至少有一百万人（主要是汉族人民）被强迁到平城及其附近，徙民“以充京师”（《魏书·太祖纪》）。这样大规模“徙民”，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北魏的经济问题，也就是屯垦农田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因此，农业生产在北魏的经济生活中，很快地占了压倒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刚出现不久的北魏国家组织，不可避免地受到被统治民族和人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各种制度的更加强烈的冲击和巨大影响。这就迫使它不能不迅速地向封建制过渡。这样的历史背景，反映在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的考古资料中，我们既看到了某些前国家阶段即原始社会的遗迹，也看到

了奴隶制和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些迹象。

### 盛乐城遗址

《魏书·帝纪·序纪》记诘汾子力微（始祖）之“三十九年（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盛乐城址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十公里<sup>①</sup>，其地北通呼和浩特，南通清水河，是汉定襄郡成乐县旧址（图一）。城址东阻小丘，南傍宝贝河。有郭城，东西窄（1550米），南北宽（2250米），形状不规整，略作五边形。郭内东南隅有南、北两内城。北



图一 和林格尔、盛乐城址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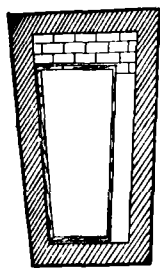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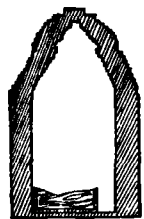
内城为唐以来所建。南内城为汉魏遗迹，该城东西残长670米，南北655米，城内文化层堆积较厚，试掘发现大量汉代建筑瓦件、生活用具和铁制农具、兵器，同出有牛、马、羊、猪骨和骨器，还有较多的北魏晚期的黑色厚瓦。发掘的资料和文献对照，大概可以说明：

一、三世纪力微选择的迁居点，是一处较长时期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的地点，当时拓跋部落有可能更多地注意了农耕。

二、但拓跋部落并未大幅度地改变其游牧经济，所以仍东西迁徙，居无定所。公元313年力微子猗卢又“城盛乐，以为北都”（《魏书·帝纪·序纪》）。公元346年力微重孙什翼犍（昭成）再一次“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魏书·帝纪·序纪》）。次年，又南迁新盛乐城。因此盛乐的考古发现，除一部分牲畜骨骼和骨器有可能是拓跋遗迹外，其他可以肯定的五世纪以前的拓跋遗物极为稀少，估计当时在这里经营农业的应是拓跋部控制下的汉族人民。

三、尽管如此，盛乐作为拓跋都城在什翼犍时期已开始稳定。与此相应，拓跋皇室才开始兴建固定的陵墓，什翼犍母“平文（鬱律）皇后王氏……（建国）十八年（355年）崩，葬云中金陵”（《魏书·皇后·平文皇后王氏传》）。云中金陵“在古盛乐城西北”（《乾隆九年大清一统志》归化城土默特），其遗迹虽迄未发现，但据文献记载知道这里是拓跋都盛乐、平城两地时的帝陵所在。

四、大量的厚重的黑瓦，表明五、六世纪之际即北魏迁洛前后，盛乐成为北魏军事要地的时期，才



图四 美岱村北魏早期墓平剖面图



图二 凉城出土的兽纹金饰牌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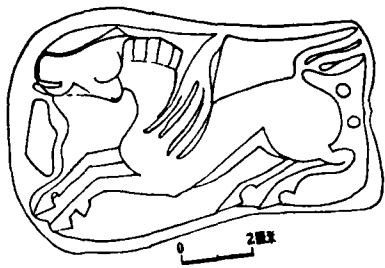
2

图三 凉城出土的金属印章 1.“晋鲜卑归义”侯鸵纽金印 2.“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鸵纽银印

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物。这种情况，在郭城的试掘中也得到了反映。郭城内文化堆积薄，可以肯定的拓跋北魏遗物，只有少量的如上所述的黑瓦。看来，汉以后，盛乐较大的修建工程并不在拓跋初迁之时。有的同志认为盛乐郭城的增建在五世纪以后，这是有道理的。

### 凉城发现的猗奴部遗物

呼和浩特东南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一批“居代郡之参合陵（今内蒙古丰镇北）北”（《魏书·帝纪·序纪》）的力微子猗奴（桓帝）部的遗物。有兽纹金饰牌（图二）、镶嵌宝石的兽形金饰、饰以兽首的金指环、金耳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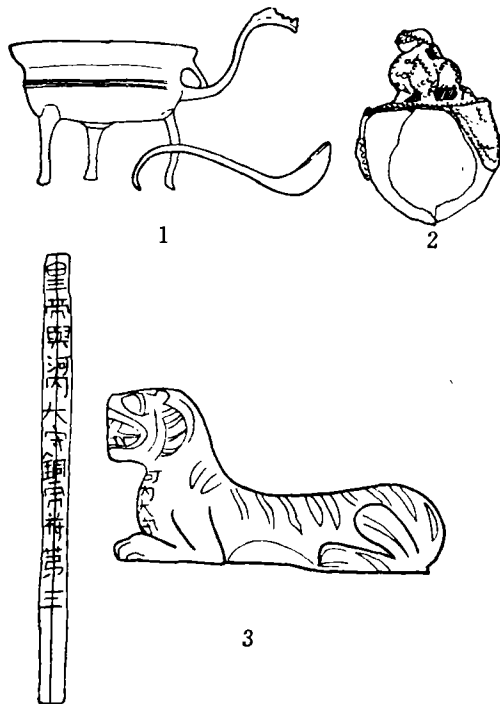
图五 扎赉诺尔出土的飞马纹铜带饰

和驼纽“晋乌丸归义侯”金印、驼纽“晋鲜卑归义侯”金印、驼纽“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图三)。其中一件兽纹金饰牌的背面刻出“猗寇金”三字(图二),猗寇即猗屯,明确了这批遗物的所属。猗屯于西晋末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上述三印铸、彫皆草率,大约即是这时的赠品。金饰牌的纹样是用錾鏤的技法制出的,这种錾鏤的金牌是匈奴贵族喜用的饰具,金指环作出动物装饰和金饰镶嵌宝石的风习也是匈奴文物的特征。匈奴贵族的风习,虽然在拓跋上层中日益深入,但在这批金饰的具体的装饰纹样上,似乎还发展着拓跋自己的特色,与匈奴异趣。匈奴金饰习惯饰以鹿纹、狩猎纹、野兽搏斗和禽兽搏斗纹,而凉城的发现都以狼、狐和它们成群的形像为主,还有奔驰的骏马。后者大约还可以和扎赉诺尔墓群所出的飞马纹铜带饰(图五)以及《魏书·帝纪·序纪》所记引导拓跋部迁移“其形似马”的“神兽”联系起来。狼、狐也是邻近农耕地区的草原边缘所常见的兽类。

### 呼和浩特美岱村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

呼和浩特市东南美岱村南宝贝梁山沟中发现的北魏墓(图四),可能是四世纪末拓跋珪建魏国前后不久的遗迹<sup>⑨</sup>。一墓中出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图六:3),证明这是拓跋贵族的墓葬。前述几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的特点,在这里已经极少了,

不仅殉牲没有了,弓、镞的随葬也没有了,骨角器也没有了。这里最突出的随葬品,是当时汉族墓葬中常见的大量的细泥陶器(一座墓中出有三十多件陶罐、陶壶),这表明他们已营定居,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农业开始占了优势。文献记载北魏初期驱使各族人民在河套地区大规模屯田,屯田河套对北魏初期的拓跋的社会发展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前设墓道的砖室墓,附有铁环的木棺,一些铜制用具如鍬斗勺、(图六:1)、灯和金饰品(图六:2)、漆耳杯、漆鞘长型铁刀以及较多的货币(一墓出有二十枚“大泉五十”)随葬等,都已和当时汉族上层的墓葬没有太大的区别。特别是拓跋铸造的虎符,除上述河内太守虎符之外,过



图六 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出土的器物

1. 铜鍬斗、勺 2. 金指环 3. 虎符



图七 大同出土的北魏陶器纹饰瓦当

去在山西大同东郊发现有同样形制，应属同一时期铸造的博陵、上党、辽西太守虎符和离石、吐京、阳曲护军虎符<sup>④</sup>，表明拓跋族正在加强国家政权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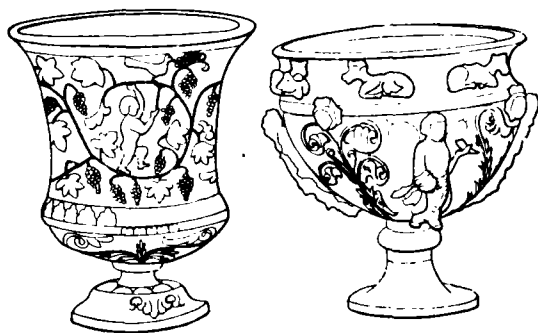
在美岱墓中还可看到一些旧的因素：木棺还保存了前宽后窄的形制；陶器在器形和磨擦、弦纹等加工技艺上，还保留了一定的乌兰察布和南家营子乃至札赉诺尔的特点；铜羊矩骨应是以前常见的羊矩骨的仿制品；乌兰察布和南杨家营子饰物中喜用铃饰的风俗也保存下来。此外，还有不少带有匈奴风格的器物，以动物作装饰的金指环(图六:3)和禽兽搏斗纹样的铜饰牌等。(参看《文物》1977年5期53页图一一)

### 北魏平城及其附近遗迹

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天兴二年(399年)迁都”(《水经注·灤水》)于汉平城。天赐三年(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魏书·天象志》)北魏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城区及其附近。其地北阻方山，东西皆傍如浑水。历年来，在大同城北的小北城内外以及迤北的大同车站附近，发现了不少北魏波纹、连珠纹、忍冬纹的灰黑色陶片·布纹大瓦和莲纹、“富贵万岁”隶书体铭的瓦当(图七)，大同车站东北方还出有排列整齐、间距5米的覆盆礎石，礎石厚20厘米，70厘米见方，石面承柱部分的直径达45至50厘米<sup>⑤</sup>。这些重要遗迹表明这个区域应是北魏宫城和宫城前衙署的范围，而大同车站北方现存的一段夯土残垣，或许即是宫殿北壁的遗迹。文献记载宫城北、西两面设苑，东建太子宫。宫苑不仅占据了整个平城的北面，且扩张到城东、城西。当时江南人记录平城的情况：“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绶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宫城中“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南齐书·魏虏

传》)。这些，都充分说明平城时期北魏宫苑之所以占地广大，主要的并不是为了皇室遊猎而是由于宫廷经济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质，北魏皇帝还直接役使着奴婢进行包括畜牧在内的各种生产的缘故<sup>⑥</sup>。

修建宫苑的同时，还“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魏书·太祖纪》)。拓跋嗣(明元)泰常元年(422年)又“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魏书·太宗纪》)。平城地势北高南低，其外城和外郭主要在宫城南面。《魏书·莫含传附孙题传》云：“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邳、洛、长安之制”，可知拓跋珪规划的外城，是以中原都邑为蓝本的，而模拟的对象首举邳城，邳城正是宫苑在北，市里位南。平城外城多驻卫军，所以《南齐书·魏虏传》说：“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魏虏传》又记：“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悉筑为坊，说明郭城布局和外城相似。平城发展很快，到拓跋宏(孝文)太和十五年(491年)时，即已“里宅栉比”(《魏书·释老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相当于平城南郭外的大同南郊工农路北侧，清理了两处北魏居住址，其一出土彫刻精致的石砚，另一出土具有浓厚西亚风格的银碗和鎏金高足铜杯(图八)，附近还散布有方形石礎<sup>⑦</sup>。



图八 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铜杯

估计郭城内的坊里和附郭近郊绝大部分是安置拓跋皇室、亲密的帝族、勳旧諸姓、各族官僚以及各地大商贾的所在<sup>⑧</sup>。至于拓跋多次从各地强迫迁来平城的汉族和各部落的人民,则被置于“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南极阴馆(今山西代县),北尽参合(今山西阳高)”(《魏书·食货志》)的畿内之地和如《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所记的千里“甸服”之区。使各部落人民“散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北史·外戚·贺訥传》),并“劝课农耕,量校收入”(《魏书·食货志》)。这样安排,既将许多部落人民与旧日的酋长分离,使“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北史·外戚·贺訥传》)。又迫使居住帐幕的遊牧生涯改为定居的农业生产,显然这是北魏统治加速国家建设的重要措施。

五世纪以来,北魏境内各族人民和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拓跋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为求“国祚永康”、“长辞八难”(云冈石窟十一窟太和七年〔483年〕《五十四人铭》),提倡佛教,在平城内外大事兴建佛教建筑,原存山西朔县崇福寺的一件高约五尺雕造精细并有“天安元年岁次鹑火(466年)……平城造”铭的石塔<sup>⑨</sup>(图九),是现知北魏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佛教遗物之一。塔方形,九层,第一层四面都雕出双阙,这应是当时平城城内“桀跼相望”的“神图妙塔”(《水经注·灤水》)的仿制品。位于平城西约十五公里的武州川旁的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灤水》)、“石龕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諸巧丽,龕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曇曜传》)。云冈开始雕凿约在和平初(460年)以后不久,全部停工应是“终乎正光”(520—524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其间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之前。

时间这样短促,工程又这样艰巨,再加上同时平城城郊还有数不清的兴建项目,可以估计当时工役,不能不带有奴隶劳动的性质,如以隋唐时代开凿石窟的规模远远不及云冈来比较,就更加清楚地看出北魏开凿云冈的工程,是如何既残酷而又野蛮地奴役各族人民了。

### 平城附近的墓葬

差不多整个五世纪,平城一直是拓跋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附近应分布有较多的墓葬,但现发现的仅有方山和大同东南郊两处统治集团上层的陵墓。

方山今名梁山,在大同北,其地两川夹流,俯瞰平城(图一〇)。拓跋宏(孝文)于太和十四年(490年)葬其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于此。墓在方山上,俗呼祁皇坟。墓地系冯氏生前所自选,墓园自“太和五年(481年)起作,八年(484年)而成”(《北史·后妃·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其大体布局,现尚可识辨。

墓园最南有围绕迴廊的塔院遗迹,迴廊基宽近十米。塔基方形,长40、宽30米。塔院遗迹北约200米的高坡上,为一长方形建筑遗迹,遗址散布礎石、残瓦,残瓦中有“传祚无穷”、“富贵万岁”隶书铭瓦当和莲花、化生等纹饰的瓦当;还分布有黄色石灰岩的“文石”断片和一件原来树碑其上的石龟趺。此遗址北约600米处,即高大的冯氏墓冢(永固陵),冢基底方形,南北长117、东西宽124米,上部作圓形,自基底至冢顶现存高度为22.87米。冯氏墓冢东北约800米,有约60米见方,现存高度约13米的另一大冢,即拓跋宏豫营的虚宫“万年堂”<sup>⑩</sup>。以上墓园情况,与《水经注·灤水》所记:“(方山)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庙前镌石为碑兽……有思远灵图”相符。拓跋宏虚宫之北,尚有较小的墓冢两处,準北魏金陵制度,约是永固陵的陪陵墓。近年在墓园附近发现石

窟残迹，这约是《魏书·高祖纪》上所记太和“八年（484年）秋七月乙未行幸”的“方山石窟寺”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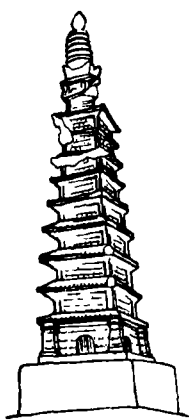
冯氏墓（永固陵）墓室早年被破坏，1976年进行了清理<sup>⑥</sup>。墓室砖建，位于墓冢的中心，南向，由甬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全长23.5米。过道前后设石门两重，门框浮雕下具龕柱的莲瓣形券面，龕柱上部浮雕孔雀和捧蕾童子各一。主室弧方形，南北长6.4米，东西宽6.8米，四角攒尖顶，高7.3米。室内残存石俑、陶罐、铜铍、铁矛头和铜簪、骨笄以及玻璃小环、丝织品残片等。

冯氏墓和墓园工程浩大，拓跋宏（孝文）太和十四年（490年）诏：“今以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北史·后妃·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制度逾恒，这既和冯氏生前两度“临朝专政”，前后长达十余年相适应；也反映了北魏一朝礼制的特殊性。拓跋自原始社会末期，迅速地进入阶级社会，原始残迹的保存较为严重，母系家族特殊权势长期存在，太后摄国事极为习见。四世纪

中，猗奴（桓帝）死后，其妻惟氏临朝，“时人谓之曰女国”（《北史·后妃·魏桓皇后惟氏传》）；什翼健（昭成）幼冲，“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太）后之力也”（《北史·后妃·魏平文皇后王氏传》）；拓跋珪（道武）初立，也因母后规策“而免难”（《北史·后妃·魏献明皇后贺氏传》）。拓跋珪建国之后，旧风犹存，文献记载拓跋宏时，太皇太后冯氏一家炫赫一世；即使到了六世纪，北魏末年，拓跋恪（宣武）后胡氏尚得拓跋上层支持，“亲览万机”（《北史·后妃·魏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由此可知，“万世所仰”规模宏巨的冯氏墓及其墓园的出现，和一般的历代后戚擅政，墓葬僭制者不同。其实女系权重，贯串在整个北朝的鲜卑民族中，所以直到东魏元善见（孝静）时，临淮王孝友奏：“（上下）无妾媵，习以为常……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北史·魏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曾孙孝友传》）。北齐颜子推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颜氏家训·治家》），此恒代遗风，即是原始制度的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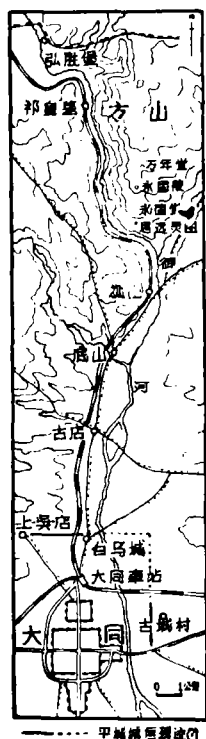
墓地和佛寺接合起来，是冯氏墓园的布局特点。冯氏系北燕冯弘孙女，北燕提倡佛教，五世纪后半，冯氏及其兄熙佺佛，广建佛寺，方山墓地既为冯氏所自择，墓园兴建又正当冯氏听政时期，因此估计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园布局，很有可能出自冯氏本意。由于冯氏在北魏的特殊地位和当时“今以陵万世所仰”的有意安排，所以这种墓寺结合的作法，影响到北朝晚期统治集团的陵墓，甚至影响到北朝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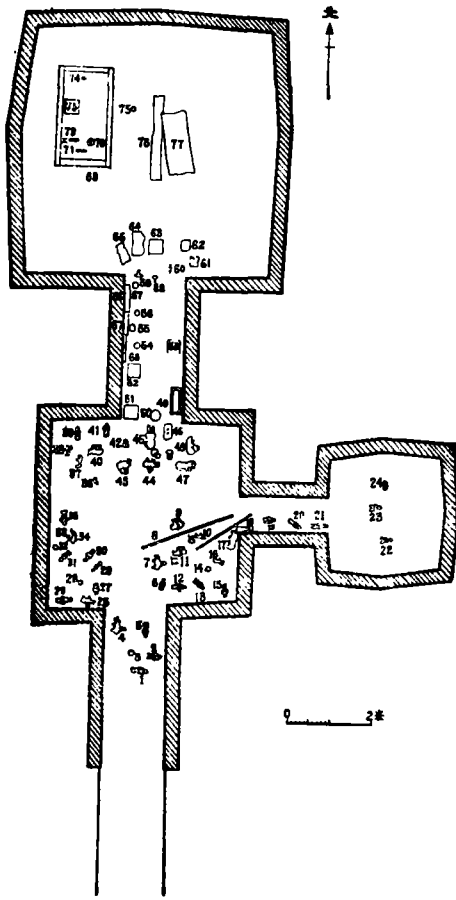
大同东南郊，约是平城的墓葬区域<sup>⑦</sup>。北魏延兴四年——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图一一），即发现在大同市东南石家寨村<sup>⑧</sup>。墓砖建，具前、后、耳室。前室方形，后室、耳室皆弧方形。前、后室间设过道。墓室全长约14米。甬道长约4米。斜坡墓道长28米。后室右侧设石棺床，床上



图九 原藏朔县的  
天安元年铭石塔

图一〇 大同方山  
一带地形示意图





图一 大同司马金龙夫妇墓平面图

- 1、13、21、26.胡俑 6、12、29、30.女俑16、38.猪 48镇墓兽 53.姬辰石铭 57.灰陶壶 66—68.木板漆画 2、14、19、27、31、39.男俑 17、47.大陶马 10、37.陶羊 45、46.大俑 54.青瓷唾壶 58.残铁锅 69.石棺床 70.残石砚 71、72.木栏杆 74.木伞顶 5、15、20、28、35、41.武士俑 36.陶鸡 42.陶狗 4、7、25、44.骑马武士俑 59.铁马镫 51、52、63、73.屏风石跌 60.铁剪 9、11.驮粮陶马 40.陶牛 18、50.石灯座 55.釉陶器盖 61.木枕 62.漆食盒 75.木兽头 33.木俑 34.木马 43.陶骆驼 49.司马金龙石墓表 56.彩陶器座 64、65.残漆画 76—77.木棺板 22、23、24.女乐俑 8.竹杆(?)

除残棺木外，有石砚一方。床前原设漆画屏风。后室前部和过道后部置日用器物如陶壶、青瓷唾盂、漆多子盒和铁剪、铁马镫等。过道前部东侧置司马金龙夫妇石铭表。过道入口正中立石灯座。后室和过道部分的布置和同时的南方地区以及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较高

的统治阶级的墓葬基本一致。前室后部扼过道口处置大型武士俑和镇墓兽，其西侧有陶犬、马、牛、羊、驼、猪、鸡一群。前室前部满布陶俑，位置已扰乱，计有着甲骑俑、武士俑、男女立俑和木俑共三百二十余件。此外还有大型陶马、驮粮马、木马等三十余件。耳室出女乐坐俑三。全部俑群数量较多，内容和同时的中原地区的类似墓葬相近。其不同处：牲畜成群存在，并未见有与庖厨有关的其他明器，推测这有可能是平城时期北魏上层统治集团还保存一部分畜牧经济的反映；大部陶俑的面貌既不类汉族，也不像中原地区常见的胡俑，大概是拓跋人民的形象。司马金龙是投降北魏的晋皇室的后代，文献记载他们父子兄弟开府云中，历数十年，或尚主，或封王，金龙父楚之死后还受到北魏皇室的特殊优遇，“陪葬金陵”（《魏书·司马楚之传》）。他们生前死后都和拓跋贵族同样奴役剥削各族人民，“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司马金龙夫妇墓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实物例证。前后室附耳室全长14米的墓室形制和包括骑俑、女乐俑等在内的三百六十件以上的随葬明器，大约也是根据汉族除皇室以外的最高等级的葬制，这一点，不仅可以补充中原地区这段时间这一类型墓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形象地说明了五世纪中叶以后，平城地区汉族的上层人物，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们旧日的奢侈生活，并强烈地谋求恢复封建的等级制度。即使他们的代表崔浩刚被灭族（450年），这种倾向也未稍减。拓跋治下的汉族地主阶级之所以敢于抗衡，很显然是利用了日益增长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实力。此后不久，拓跋宏进一步加强国家组织的封建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镇压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反抗，以巩固拓跋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而出现的。

## 北魏北部军镇遗址

五世纪初,我国北部的柔然族已成北魏的强敌,北魏为了保卫平城,在平城北、西两面,修建了不少军事性的城镇,其遗址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都有发现。

土城梁古城,位乌兰察布盟武川县西南二十余公里<sup>④</sup>,有的同志推测即是六镇中“景明中(550—553年)筑,以御北狄”(《水经注·河水》)的武川镇城址。该城扼南入大青山“白道中溪”的西侧,城南、东南和西南皆为大青山主脉所环绕。城分南北两城。南城小,其南北壁长(约130米),东西壁短(东壁约百米,西壁90余米),南壁正中开门。城内中部偏北存有长35、宽30、高7米的建筑台基,附近分布北魏时代的布纹瓦、筒瓦和兽面瓦当、“富贵万岁”隶书铭瓦当,还出有铜镞、铁镞和铁犁等物。城外东、西、北三面也散布着和城内相同的瓦片、瓦当。北城面积大,南北长约400余米,东西宽约300余米,位南城正北,相距约50米,城内遗物略与南城同。

石子湾古城位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石子湾村东<sup>⑤</sup>。城北阻小河,东西为起伏的山岭。城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160米。城内多基台遗址,除遍布与土城梁古城相同的瓦片、瓦当等外,还有绳纹砖和简化的晚期卷云纹瓦当,城外东、西、北三面都有较厚的包含各种建筑材料的北魏文化层。

两处城镇遗址大体可以表明当时北魏北部军事城镇布局的特点:存有建筑台基的主要防区设在遗址的南部,即背向后方的方位;主要防区的前面阻有河流,并在前方和左右设有与主要防区相呼应的外围据点,形成在军事上的有利局面。两处城镇遗址的全部面积较大,证明当时军镇拥有大量的官兵“府户”。文献记载其中有很大数量原是拓跋贵族“国之肺腑”(《北齐书·魏兰根传》)。遗址所示镇城内外原多建有砖砌铺瓦的木构

建筑和农具出土等现象,说明这些居住北方的拓跋上层,至少到北魏晚期,也改变了居住条件并经营了农业,所以出现了如文献所记六镇高级军官“专擅腴美”,戍兵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的情况。

坝口子村土城,位呼和浩特市西北五公里坝口子村南<sup>⑥</sup>。北傍大青山,扼北通武川的大道。城东西宽360米,北壁地面上已无痕迹,故全城长度不详。城内南距南壁约170至190米处筑东西向土墙一道,分城内为南北两城。南城内西距西壁约150米处又有南北向土墙一道,分南城为东西两部分。北城中部以北,压在坝口子村民居下,中部偏南似有子城。有河,现从城北入城,穿北城、子城的西部和南城的西部的中间而南。有的同志根据此城的位置和形势,对照《水经注·河水》:“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紫带长城,背山面泽”,“城北有高坂,谓之白道岭”的记载,认为和北魏时代的白道城相似。白道城是大青山北诸镇城的后方据点,应是更高一级镇将的驻所。北城中部的子城,大约是这高级镇将的衙署住宅区。城内地面遗迹以北城西南隅比较显著,分布有板瓦、筒瓦、绳纹砖和各种陶片。在河经北城中部靠近子城附近的东岸,发现典型的北魏晚期石刻佛像背光的残片。距背光残石出土地不远的地方,还意外地发现了四枚波斯萨珊朝银币,其中年代较迟的是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 531—579年在位)时所铸。这个发现,证明北朝晚期北方的边镇也和遥远的西亚存在着交通贸易关系。其经由路线,有可能自平城北上,但也不能排除自河套地区向西经“北虏往来之冲要”的西海郡(即“汉晋旧郾”居延,《魏书·袁翻传》),抵伊吾、高昌,再西去的路线。

### 呼和浩特市发现的北魏墓

1975年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南侧发

现的北魏砖室墓<sup>⑧</sup>，平面弧方形，棺床设在墓室右侧，除武士俑外，男女陶俑的面貌服饰以及陶猪陶羊前后肢不分左右的作法等，都和司马金龙墓的情况相同或相似。这些相同或相似，有力地说明它们时代的接近。可是类乎辽宁巴林左旗拓跋族墓葬中出现的用工具压捺出点纹装饰的陶器，在这里出现了。陶罐也“与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初期（拓跋贵族）墓中出的陶罐完全一致”。这些迹象进一步表明这座墓可能比司马金龙墓略早而墓主人可能是拓跋族。至于该墓漆棺的使用，一套中原流行的陶仓、井、碓、磨、灶等庖厨器的出现和象征墓主人外出乘坐的陶牛车的随葬等，反映了墓主人生活习俗的浓重汉化。司马金龙墓出现的女坐乐俑，这里发现的更为齐备，并布置了翩翩起舞的舞俑，汉族大族追求生活享受的风习，看来也影响到这里。呼和浩特一带，原是“分土定居”之区，墓葬所在又位于北部重镇白道城的近郊（东北距坝口子村土城不过五、六公里），太和以前，北魏“盛简亲贤，拥麾作镇”（《北史·魏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孙琛传》），屯戍北部的各级将士乃至戍卒，绝大部分也都选自拓跋贵胄或强宗子弟，因此，这座墓墓主人的身分，可以肯定属于北魏的统治阶层。在距都城平城北一百五六十公里的大青山下的北魏统治阶层的墓葬，出现了这样汉化程度甚深的现象，可以估计当时平城附近汉化的程度当然更深。生活习俗的汉化，反映了这个地区经济生活的变革，平城附近及其以北，自五世纪中期以来，尽管畜牧经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却终究阻止不了定居的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五世纪末，拓跋宏锐意推行全面汉化政策，以加速北魏社会的封建化，虽然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呼和浩特市的这处发现，似乎可以说明，即使在拓跋统治阶层内部，也早就出现了赞同改革的力量。

① 张郁《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纪要》（《内蒙古

文物资料选辑》）。

- ② 李逸友《内蒙古出土文物概述》（《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 ③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2期。
- ④ 马衡《北魏虎符跋》《考古通讯》1965年4期。
- ⑤ 驹井和爱《东亚考古学·北朝之佛迹》（东京弘文堂，1952。）水野清一《大同近傍调查记·平城遗迹》，（《云岗石窟》第十六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
- ⑥ 当时北魏太子也有自己经营的田畜贩酤，《魏书·高允传》记拓跋晃为太子时“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鄽，与民争利……（愿殿下）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效……恭宗不纳。”
- 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72年1期。
- ⑧ 《魏书·韩麒麟传附孙显宗传》记平城里坊居民的变化情况：“太祖道武帝创基拔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
- ⑨ 莫宗江《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此石塔，抗战期间被日本军国主义窃去留东京帝室博物馆，战后又被他们私运去台湾。
- ⑩ A. E. Wenley《The Grand Empress Dowager Wen Ming and The Northern Wei Necropolcs at Fang Shan》（Frees Cl l-ery of Art, Occasional papers, I. I. Washington, 1948）。水野清一《大同近傍调查记·方山遗迹》，（《云岗石窟》第十六卷）。
- ⑪ 大同市博物馆《我市出土一批珍贵的石雕艺术品》《大同报》1976年7月20日。
- ⑫ 北魏皇室、帝族、勋旧、余部之外的墓区，据文献记载知在平城东南桑乾河两岸。《魏书·王慧龙传》：“王慧龙自云太原晋阳人……真君元年（440年）……卒。……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为文明太后冯氏所宠追赠王爵的晋阳人王桥、王叔“父子并葬（平城）城东，相去里余”（《魏书·恩倖·王叔传》）。拓跋焘（太武）保母突太后自选的墓地和“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北史·卢贵元传》）追赠襄城王的昌黎徒河人卢鲁元的墓地，都在平城东南桑乾河南岸的崞山。
- ⑬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 ⑭ 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3期。
- ⑮ 盖山林《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石子湾古城调查》《考古》1965年8期。
- ⑯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坝口子村土城调查记》（未刊）。
- ⑰ 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5期。